



编者按

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4周年，本版刊发相关文章，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战略问题
是根本问题

——读《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

□丁国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富有战略眼光的政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战略方略的谋划运用。领导干部学习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对于增强战略思维、提高战略能力具有积极意义。张文木的《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对于毛泽东在国家统一、军队建设、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国际战略和策略、抗日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战略思想进行了生动论述。

战略是对全局和未来的考量和谋划。习近平总书记说：“战略就其本来意义而言，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战略思维是一种全局思维、前瞻思维、科学思维。战略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事业的成败。战略不仅决定制胜的方法而且树立夺取胜利的信心。1939年，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援华医疗队时说：“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地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正是因为始终站在战略制高点上，我们党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战争局势面前始终保持一往无前的勇气。

深谋远虑才能运筹帷幄，远见卓识才能把握未来。战略布局是一种魄力，也是一门艺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毛泽东的战略不仅棋高一招、超人一筹，而且灵活机动、不落俗套。他曾经

比喻，与日本人作战好比下围棋，作战就是“吃子”，建立根据地就是“做眼”。眼做多了就搞活了。卓越的战略家具有大格局、大视野、大智慧，能够超越平庸思路和错误意见，而大多数人只能在原地打圈圈。

战略既是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对各种力量和资源的综合调度和运用，也是在更高视野、更大范围上对问题和发展趋势的观察和分析。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居窑洞之侧，观天下之变，显示出强大的战略预见力。1939年1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历史证明，这一判断是准确的。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战略思维既是对未来的科学预测，也是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张文木说：“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同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交谈时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战略说到底是一种比智慧、比定力的政治较量。古田会议报告就强调“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是从党的政治和全局出发作出的安排和选择，所以就有了一种超越军事斗争的力量。聂荣臻曾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红军打仗，打的就是政治。”张文木认为，毛泽东将军事有机地融入政治。克服机械性，富于灵活性，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做决策、做工作，是毛泽东的基本工作方法。通过发现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来作出攻击敌人薄弱环节的战略，是毛泽东的政治智慧所在。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张文木认为，毛泽东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果建立在工农联盟之上，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战略不是空想，而是基于对实际情况的准确把握。实事求是作出正确战略的基础。作出正确战略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的过程。毛泽东指出，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说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不考虑现实条件，一味拍脑袋决策，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毛泽东的克敌制胜的军事智慧里面蕴含着知己知彼、把握全局、预见未来的战略思维。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毛泽东既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位富有战略远见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战略思想对于夺取革命胜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发挥了重大作用。



□ 杨 海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一书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他强调，当前“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因此，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应提升风险意识。

提升新时代风险意识——这是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中各式各样的结构性风险问题而作出的判断。例如，经济安全不但要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与国家安全为前提，也要以科技安全、网络安全和资源安全为支撑；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等安全风险问题越来越依赖于多边机制与合作对

话这一带有“总体”性特征的共同安全思维来解决。没有意识到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才能更充分，需要我们更深入估量新时代结构性风险应对的难点和复杂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立足当下国情保安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提升风险意识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



□ 李志萍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早期，就对整个抗日战争作出了符合实际且为抗日战争实践结果验证的科学预见。他在《论持久战》中运用的军事预见方法论，从军事哲学方法论的高度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宝库，不仅气势恢宏、独具特色，而且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运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预见抗日战争。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开始了全面抗战。半年多以后，党内外出现了关于抗日战争前途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亡国论”者只看到日本的军力强大，得出中国“战必败”的结论；“速胜论”者仅仅看到打了几胜仗，就得出中国“速胜”的结论。当时，这两种错误预见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毛泽东则实事求是、客观冷静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客观实际，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

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所说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观点，就是要求从战争的全部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中，对战争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把握战争的规律性，并据以推断其可能的发展趋向，科学地预见战争的进程，从而给战争以有力的指导。

通过考察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条件预见抗日战争。毛泽东在预见抗日战争的前途时，把抗日战争的矛盾放到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从而判明战争的性质、推断其发展趋势。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这里所说的全部根据就是整个世界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规定和影响着战争双方的特点和力量对比；影响着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毛泽东同时指出：“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而

中国则“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大的经济危机，日本为了挽救其帝国主义制度没落的命运，发动了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然而，发动战争非但不能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反而加重了本国人民的负担，使国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财政危机更加深化，其结果必然会加速其灭亡。而中国则正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和觉醒了的人民，有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有了数十年革命的经验，同时，又有“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形成了中国广大人民和中国军队的一致抗日。正是这种处于特定时代之中的日本的退步性和中国的进步性，成为中国可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

着眼辩证分析敌我双方基本特点预见抗日战争。毛泽东从大量纷乱的抗日战争表面现象中，找出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通过对比分析其内在联系，从而对抗日战争进行了科学的预见，得出了科学的结论。毛泽东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等条件，从军事、政治、经济、人力、物力等方面，概括了中日双方的“四大”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中日双方这“四大”基本特点即“四对矛盾”，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中日战争复杂的有机统一体。因此，我们不能依据任何一个孤立的因素来预见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结局，只有把敌我双方的全部基本因素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从总体上看，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一气呵成。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相反，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由于日

办公室里学问

□ 钟效石

更把办公室工作放入大跨度的时间、空间范围，以巨古及今的恢宏视野追溯了古代以来的办公室工作，以放眼世界的国际视野俯瞰了办公室工作的历史、现状，着重强调了新技术在办公室工作中的应用，并以展望未来的超前视野勾勒了办公室工作的发展趋势及应对措施。

办公室工作十分重要，每个单位办公室都是一个单位的中枢部门。无论对于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办公室作用发挥的好与坏，直接决定着整个单位工作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加强办公室工作规律研究，对于做好办公室工作意义重大。

从学科说，对办公室工作的研究，长期以来是在公共管理和领导科学中开展的，更多的是同秘书学一起来研究，或者说同秘书学是混同的。这种研究是不够的。办公室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办公室学有必

要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和科学。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作者的这本《办公室学》的出版，是具有拓荒意义的。

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本书的框架体系严谨、完整。全书分为八篇，从办公室的职能定位出发，进而谈办公室的各项业务，又从静态的业务写到机构和运行，最后是队伍保障，一气呵成。这已经具有了一个初步的成型的办公室学的理论体系。这也是本书称为“办公室学”的一个重要指标和原因。

二是本书紧密结合实际。作者长期在中央党校办公厅工作，注意结合本职工作是他一直以来的特点。他对办公室工作比较熟悉，不仅熟悉工作层面，还对规律性的东西作出思考和概括。如，对办公室类型及其意义的划分，如果缺少切身体会，很难想象能作出如此的概括，读后让人眼前一亮。

本的帝国主义制度和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敌小我大的特点，决定了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抗战；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以及世界形势之寡助，中国战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以及世界形势之多助等特点，又决定了日本必然失败和中国的最后胜利。

着眼敌我双方力量的发展变化预见抗日战争。毛泽东在预见抗日战争持久战的发展过程和各阶段作战形式时，认为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及敌我力量的发展变化，决定抗日战争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在此阶段中，我所采取的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我方力量将获得发展，敌方力量将受到遏制和削弱。第二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这是一种敌我相持的战略态势。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这是最困难的时期，但它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抗日战争能否胜利的关键阶段。第三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这时，我所采取的主要作战形式将是运动战，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而以游击战辅助之。毛泽东分析认为，以上三个阶段看法，是依据敌我既定的与将来可能发生的双方向相反对比之具体条件，而作出的一种对于整个战争过程的估计，并不是事实，而是一种可能的趋势。要依我之主观努力，创造出为这种可能趋势所必要的条件，才能使可能趋势变为事实。但后来抗日战争的实践完全证实了：中国人民和军队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在毛泽东抗日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使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情形的预见，由可能趋势变为事实。



三是文风朴实，娓娓道来。本书大部分篇幅用叙述体的写法，对办公室工作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挖掘和论述，难能可贵。全书通俗易懂，语言鲜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 杨 海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一书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他强调，当前“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因此，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应提升风险意识。

提升新时代风险意识——这是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中各式各样的结构性风险问题而作出的判断。例如，经济安全不但要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与国家安全为前提，也要以科技安全、网络安全和资源安全为支撑；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等安全风险问题越来越依赖于多边机制与合作对

话这一带有“总体”性特征的共同安全思维来解决。没有意识到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才能更充分，需要我们更深入估量新时代结构性风险应对的难点和复杂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立足当下国情保安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提升风险意识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

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与深水期，我们将面临着许多困难与风险相互交织窘境的考验，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知危图安。只有具有自觉的风险意识，才能更好地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更好地规避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各种风险。

从世界风险社会的维度来看，主导当今世界的价值体系正在从“不平等”向“不安全”转换。基于这样的价值体系的转换，德国著名的现代风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他的名著《风险社会》中把现代社会的风险称之为“文明的风险”，并指出，当今世界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与之相应，英国著名风险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则用“失控的世界”来描

绘风险社会的风险景观。这就让人们感觉到，现代风险有如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当代启蒙的主导理念上说，风险社会所表达的是一个个别情景与原则上需要开展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自我矫正的社会。只有积极地反思反省，才能有效建构现代风险价值体系，重构风险价值观念。比如，当今社会生态文明的建构要求批判地否定资本主义一元现代性，倡导和实践多元现代性，使人们在生态意识上实现普遍的文化自觉，通过重塑风险价值观念唤醒人们的风险意识，进而实现具有生态意义的生产与生活。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关于增强风险意识的思想养料。例如，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

民族精神中的瑰宝，它的价值在于集风险认知、判断及风险消解于一体。《孟子·告子下》中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是超前意识、风险意识与情感体验的集合体。风险意识在忧患意识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总是受某种利益所驱动，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冒着风险去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的利益伤害与损失。再如，中国古代对冲自然灾害风险的“荒政”也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原始风险意识。因为频繁的自然灾害必然会在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秩序等方面产生一定的震动和不利影响。即灾荒有可能引发政治动乱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后果。中国古代的荒政大多具有补偿、分摊和转移意外损失，带有一定社会保障意义

的经济手段。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风险意识，这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挖掘、梳理，并从中汲取更为原始的，新鲜的风险意识的思想精髓，为提高新时代领导干部驾驭风险的本领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强调风险意识提升并不意味着要把风险控制在“零”的状态，不能为了追求绝对安全而不计成本地背上沉重负担，甚至顾此失彼，也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各级领导干部应树立必胜信念，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性思维为指导，坚定不移把国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推向前进。

